

## 大海捞针的乐趣

——关于《1894, 中国纪行》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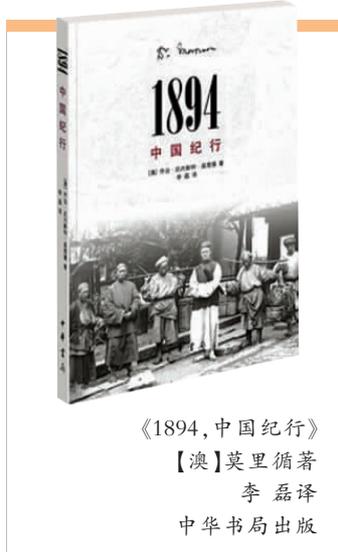
■ 李磊

莫理循著《1894, 中国纪行》(原名 An Australian in China: being the narrative of a quiet journey across China to Burma, 意译:“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安然穿越中国到缅甸纪行”, 正式中译名由出版社中华书局代拟)是一本外国人看近代中国的重要而有趣的书,算得上一本名著。作者是十九世纪末《泰晤士报》远东特约记者,国民政府政治顾问。当初我译完该书时,没写什么译后记。但是后来还是经常回忆起工作过程中考订名物的那些繁杂而愉快的经历,不时与朋友们谈起。朋友们也觉得有趣,说可以写出来分享一下。那就说几件考订的事情吧。

莫理循经常在书中引用经汉学家译成英文的中国诗文和格言谚语,意想不到的,这些引用并不十分大路货,这让我一度大吃苦头。比如作者开篇就说,他事后“总是愉快地回忆起这次旅行……沿途体验到始终如一的友善、殷勤和最迷人的礼貌”,在他看来,“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他们的格言——deal gently With strangers from afar”。这句英文的字面意思是“要温柔地对待远方的客人”,这是哪句中国格言呢?我知识面没有那么广,搞不定,就暂时搁置,先去弄别的,但脑子里放不下。阅读了很多东西以后,我产生一个模糊判断,这与那些已经在民间流传的格言不一样,很可能出自当时的中外交流文献,而且strangers from afar这个词组对应的中文概念很可能是“远人”。按照这个思路,我在有一搭没一搭阅读各种相关文献时就加以注意,后来终于在乾隆《勅諭瑛咕喇国》的英文文本中看到十分类似的词句 treat strangers from afar with indulgence,再到《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中查出对应的中文为“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两处的差别仅在于 gently 和

近义词 indulgence,这基本算是搞定了。而且,乾隆的那篇勅諭在当时蜚声中外,莫理循引用它正合情理。

类似的更加令人头大的是,莫理循走在重庆的乡野驿道上,初春时节,风光旖旎,农舍古朴,莫理循说:“关于这片乡土,可以像一个中国旅行者描绘英国那样描写它:their fertile hills, adorned with the richest luxuriance, resemble in the outline of their summits the arched eyebrows of a fair woman(意译:丰饶的植被装点着群峰,道道山梁的轮廓如美人的弯眉)。”这是实际存在的一首中国格律诗,而且,既已被译成英文,显然在当时已经发表或传抄,如果意译,很不甘心啊。我知道一时找不到中文原诗,再次搁置而时时萦绕脑际。后来,我将十九世纪研究汉语古诗的西方汉学家作了一番调查,并按各种规则逐步缩小名单,查阅他们的相关论文。这是一项下死功夫的事,大量旧杂志,一本本一页页翻过去。功夫不负有心人,《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学刊》(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830年卷里有一篇英国人德庇时(第二任香港总督)提交于1829年5月2日的论文《汉文诗解》(On the poetry of the Chinese),其中谈到一位约于1813年游历伦敦的佚名中国诗人的十首五律《兰整十咏》,并附英译,中文为影印。莫理循所引赫然出现,为第二首首联:“山泽钟灵秀,层峦展画眉。”看到这个



《1894, 中国纪行》  
【澳】莫里循著  
李磊译  
中华书局出版

结果,长时间的苦索顿时化为一阵欣喜。

即使真是格言谚语,莫理循的引用也比较生僻。原因很多,一是中国语言也在变化,晚清时期流行的一些谚语,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进步,渐渐被废弃。比如他看见一个母亲打小孩,就立即来一句:“中国有句古老的谚语告诉我们,if you love your son, give him plenty of the cudgel; if you hate him, cram him with delicacies(意译:如果爱儿子,给他足够的棍棒;如果恨儿子,给他塞满美食)。”这一句,最终是在英译中国谚语集《贤文书》(Hien Wun Shoo, Chinese Moral Maxims)中查出的,原文是“怜儿多与棒,憎儿多与食”。而中国人自己,当然早已不用这种观点育儿了。

上述古文英译须译回中文的情况,在原书中共有二十余处,除

三四句是大路货之外,其余每一处的考订可谓大费周章,同时乐趣无穷。

地名的考订也很艰巨,我在译者序中说:“某些地名,小及村庄,究为何地,有时需要核算作者行程、查阅地方史志并顾及方言发音,几方面结合,才能确定。”比如 Chipatzu(磻坝子)、Fan-yient-sen(捧印镇)、Sengki-ping(深溪坪)、Tak-wan-leo(大关隘)等等。今举一例。莫理循在云南会泽县境内的一个歇脚点叫 Leitoupo,刚开始我一筹莫展。翻译到后来,线索比较丰富了,我先查地方史志,从中查出叙昆古道会泽段各个驿站的地名,可以肯定那个地方叫癞头坡。但这不算完。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吗?现在还叫癞头坡吗?查各种地图,无所得。后来我找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1:250000比例尺的旧军用地图,上面标有道路、山川、等高线、农田、矿区、丛林等等,地名标注到村庄一级,以红字标中文地名,蓝字标相应的威氏拼音。这时我已经确定莫理循歇脚的上一站是待补镇,下一站是功山镇,于是手指往两处的中间一点,点到的是“光头坡”。可以断定这就是 Leitoupo,所谓“癞头”,就是因患头癣而脱落的光头,即方言所称“癞痢头”,可能此地口语叫癞头坡,书面语叫光头坡。

再说说人名和官职名。莫理循遇见的人,都是实实在在确有其人的历史人物,哪怕是那些小人物,正因其小,而让我们领略到晚清社会的毛细血管的风采,如

果意译,实在心有不甘。比如莫理循在腾冲遇见一个与英国人会勘滇缅边界的“刘上校”,我通过仔细阅读各种滇缅边界勘界史料档案,最终确定这人是湖南籍在滇官员,名叫刘万胜,时任署开化镇总兵顺云协副将、滇缅界务查界委员。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书中说道:“大清海关的一个被人遗忘的天才,发明了用电报发送汉字的巧妙方法,这才使得中国人可以用上电报。”我算是研究过中国科技史的人,看到这句话,职业敏感性为之为一振——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又是一番大海捞针的查阅,才发现汉字电报码开发这样一件大事,的确至今少为人知。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开发者多为外国人,不存在中文原始资料,而这件事外国人又未必重视。虽然不难查出“被人遗忘的天才”系指受聘于大清海关的法国船长威基谒(Viguier),但我很愿意搞清楚,一个法国船长为什么能发明汉字电报码。查来查去,终于查出事情的端倪。一家名叫“大北”的丹麦在华电报公司想要开发汉字电报码,而丹麦天文学家谢勒俄普(Schjellerup)为查看中国古代天文记录而学习过中文,大北公司委托他开发汉字电报码,他根据康熙字典的索引系统,设计了四位数字编码系统,他的开创性工作由威基谒继承并最终完成。我查出这事的时间是2014年,次年,丹麦方面把这事告知中国。我建议一位在读研究生以此为学位论文研究方向,而这位研究生顺藤摸瓜,写出了一篇很有创新性的论文。

我在这本译作中加了五百条注释,大半是如上所述的名物考订,其间多次走入死胡同的同时意外地阅读了不少稀罕史料,也多次领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喜悦,其中甘苦,愿与同道共享。

(上接第一版)

葛浩文的翻译与原文信息有所偏离的现象看似不少,但仔细考察其译文,我们发现,有些偏离,也就是有的文章批评的改译或所谓的“误译”,实为译者出于更易被国外读者接受的考虑对原文本作出的创造性重构。我曾以莫言的中短篇小说集和几部长篇小说的英译为例,探讨葛氏如何在“误译”的表象之下,有时一词多译,有时唯意是图,有时“得意忘形”,有时也难免误读误译,但又瑕不掩瑜,避免了机械对等和简单“愚忠”,从而超越了归化和异化等传统翻译技巧和理念,极大提高了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可接受性。

读书:所以说您总体上是肯定这些汉学家们的英译成果的?

朱振武:其实,说葛浩文随意增、改、删莫言作品,主要是源于葛浩文给莫言的那封信。翻译《丰乳肥臀》时,葛浩文由于不得已要调整、删除和改动一些地方,便给莫言写了那封信。莫言很大度,说你怎么翻译都行。莫言的话当然不代表葛浩文真的就随便翻译了。事实上,那封信正说明,葛浩文作为一个严谨的翻译家,由于非常重视原文、尊重作者,于是稍加增、改、删,都要征求原作者的意见。葛浩文的翻译偶尔确实有误译。但更多情况下,所谓“误译”,其实是译者以更加忠实于原作的方式,凿穿文字表层,破解文本的深层

含义,并最终重新确立忠于原作而又使目标语读者喜闻乐见的译本。貌似误译,其实正是传神之笔,是妙手偶得之作。葛浩文的移译使莫言的文学想象成功地消弭了中西方语言、文化、心理和审美层面上的诸多差异,在全新的接受语境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葛浩文的成功是译无定法的有力诠释,是对机械对等和简单“愚忠”的有力回应,不仅打破了归化异化之类的成规和窠臼,也为翻译工作者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一条不破不立的翻译路径。

正是葛浩文等汉学家们的“信”很大程度上成就了莫言等中国作家,使他们的作品比较原汁原味地走向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中国文学“走出去”,不能一味地仰人鼻息,唯马首是瞻。没有创新,没有自己,步人后尘,机械模仿西人外人的作品,推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市场。

读书:在前不久举行的“再登巴别塔——文学翻译的现状与未来”的研讨会上,翻译家黄福海将汉学家霍克思与翻译大家杨宪益的《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比较,认为杨宪益的译本更好。您认为呢?中国文学由汉学家来译,或是由中国的翻译家自己译,差异化的地方在哪里?

朱振武:那个会上,我也作了发言,还专门把霍克思、闵福德翁婿的《红楼梦》英译本与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红楼梦》英

译本作了比较。我认为,霍译本《红楼梦》在过去几十年里销路和影响明显超过杨译《红楼梦》,一个重要原因,是霍译本采用的归化为主(尽量从读者的接受角度出发)的译法,更适合当时及稍后的读者。而杨译本采用的异化为主(尽量贴着原文走,以忠实为圭臬)的译法在当时和稍后有些超前。我还强调,现在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非常大,英语世界的读者越是了解和接触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学文化,杨译《红楼梦》就会越受欢迎。

读书:在当下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要实现实质性的跨越与突破,应该从哪些方面进行努力?

朱振武:要真正将中国文学文化推向世界,就必须统筹安排、整合和优化翻译资源,同时要改变观念,认清译人和译出的本质差异,形成翻译自觉。的确,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只有拥有良好的文化自觉和社会担当,才能够使中国文学文化走得更远,并为学界带来更大价值的学术贡献。莫言的作品植根于家乡土壤,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较好地做到了兼收并蓄,这是其作品走向世界的深层原因,也应该是我们考虑选择源语文本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文学文化要想“走出去”,译介什么和怎么译介应该同时考量才行。

首先,中国文学要想走向世界就要充

分利用国外翻译资源和汉学资源,但怎样有效利用是个问题。汉学家们的译作越是忠实源语,就越能证明中国作家的独特艺术魅力。但他们的翻译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汉学水平、文化操控、翻译技巧、译者个性、审美差异和意识形态等各种问题。所以中国当代文学要想真正“走出去”,我们要摒弃单纯的文学思维,不顾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和思维方式、不考虑市场因素的一厢情愿都是要纠正的。

当然我们也要重视政治因素,加强政治思维。中国文学外译过程中不可避免政治因素,认清政治因素的正当性与必要性,才能揭示西方在接受中国文学过程中的政治偏见,充分利用各种政治资源,提高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率。

第三就是要注重市场因素,培养市场思维。从英语世界这些专门从事中国文学英译的翻译家所译介的作品来看,目标语翻译家和出版商对目标市场的考察都下了很大功夫,他们的译作在英语世界的畅行与市场因素显然密不可分。随着翻译商业化和产业化的不断深入,在应用翻译领域,市场已成为首要考虑的因素。

当然,尽管是“走出去”,但我们的外译工作还是要以我为中心,为我服务,必须有主体意识,而不是迷失自己,委曲求全。事实上,越是没有自己的特色,你的文学就越走不出去。